

大历史写作的尝试

——劳马《哎嗨哟》的思想价值

艾翔

内容提要：满族作家劳马是近年来迅速崛起的文坛新秀，通过对小说《哎嗨哟》中叙事模式和历史观的解读，以及主人公吴超然“政治人”“边界人”形象的塑造，梳理出作家贯连城乡前后四十年的大历史观。

关键词：劳马 《哎嗨哟》 城乡一体 “笑”

劳马创作中短篇小说逐渐引起文学界关注后，在身边好友数次劝说下，又完成了20万字的长篇小说《哎嗨哟》，初刊于《作家》2009年3月的长篇小说春季号，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2014年9月，劳马获得蒙古国最高文学奖，提示我们需要对这位作家更多的阅读和理解。

—

《哎嗨哟》出版后，刘芳坤很快撰文指出：“在吴超然、伊百这些从农村走到城市的成功者那里，乡村和城市具有内在同一性。……劳马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找到了‘笑’的传统，这种笑是严肃的笑，也是作家有意的笑，是介于‘庄’与‘谐’之间的范畴。劳马用‘笑’统一了城乡两个对照的世界，为新世纪文学的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①可以看出，刘芳坤受《哎嗨哟》独特的写作模式启发，从中提炼出可以观照作家全部作品的创作观或研究视角。

“城乡一体”首先意味着小说并置城市与乡村作为情景空间，其次表明二者同时具有主体性而非对方的参照系。在人们的普遍认识中，革命的需要令农民地位获得了颠覆性的提升，城市里的资产阶级、旧官僚贵族以及市民阶层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抑制。到了1980年代，当城市经济成为政府工作中心后，农村再次成为城市的附庸。凭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一批现代化大都市随之建立，人们心中断裂性的历史观因此

^① 刘芳坤：《‘庄’与‘谐’之间——劳马小说的对照世界》，《当代文坛》2010年第2期。

增强,城市带来的巨大现代性焦虑也在强化着作家心中虚幻的乡村蜃楼。

劳马在自己首次创作这种长篇作品时便选取了长达40年的时间跨度和城乡一体的空间跨度。小说一共65节,其中乡村背景9节,城市空间下的情节发展绵延56节,篇幅比例为14%和86%。几位主要人物都经历了情节全过程,也就是说都经历了农村身分向城市身分的转变,其中对吴超然的描述最为丰富。吴超然这个人物生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一体化”思维的缝隙,在一个“一大二公”“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社会,吴超然有一个无法摒除顺手牵羊喜好的祖父,对此他自己描述道:“替人家挑水能捎回个瓢来,帮人家劈柴能把斧头拿回家,至于捡粪捡回来的东西可就多了,黄瓜、茄子、玉米棒子,包括我的名字。幸亏他老人家撕下的‘春联’四个字完整,如果前头掉个字或者选了中间两字,叫了‘然物’,那才叫费解,神仙也琢磨不透。关键是,我这名字,没沾上牛粪,不像我从爷爷手里接过的黄瓜、茄子,总是臭烘烘的。”^①作为成功资本家的吴超然试图消解自己带有小农意识的前辈/历史,其实正是历史断裂论的影响产物。毛泽东曾说脚上沾着牛粪的农民比知识分子更“干净”,吴超然却以牛粪为耻,并为自己“没沾上牛粪”的、带有城市智性色彩的名字沾沾自喜,通过名字——确切地说这是一种后置式赋义的历史命名行为——划清自己的城市身分(西化、现代性、资本)与险些误取“然物”之名而被滑稽化的祖父(传统乡村、“前现代”、劳动)的界限,方便自己解释历史并与官方话语口径协调一致。

赶大车的吴前方作为资本家吴超然的“前史”出现,并与祖父发生历史关联:“不管去镇里还是县上,吴前方总忘不了替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捎一些针头线脑、皮筋细布、雪花膏等杂七杂八的小零碎,……他会从中赚点辛苦费,这点小钱他不明要,而是根据货品的多少暗中加价。”^②祖父的“经济头脑”得到了后辈继承发扬,所不同的是日后将成为资本家吴超然的农民吴前方的“进化论”意义在于他发现了权力和收益的关系,因此效率相较粪里寻宝的祖父大大提高。这正如梁鸿所见:“吴超然的成功并非是依靠改革开放这一颇具现代性的制度而获得的纯粹商业活动的成功,他的成功更多地来自于他深谙中国的官场文化及权力制度的运作模式。……吴超然的商业轨迹作为贯穿的线索给我们展示了中国权力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基本存在样态。”^③劳马和梁鸿的观察启示我们,虽然社会转型时日已久,期间不断对改革进行论证和“改革的改革”,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按照所追求的西方标准衡量,当下中国并没有一支成熟的、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仅仅是一批吴超然式“先富起来的

① 劳马:《哎嗨哟》,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6页。

② 劳马:《哎嗨哟》,第13页。

③ 梁鸿:《“玩笑”与“嬉闹”背后的中国镜像——读长篇小说〈哎嗨哟〉》,《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6期。

人”，这对整体上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其他相关领域难以产生正面推动力。

无论吴超然能否归入“资产阶级”，都不可否认其生意上的巨大成功以及社会上的如鱼得水。如若仅仅呈现主人公资本帝国的断代史，对于这种人生状态只能解释为社会发展不成熟、过渡时期等有气无力的论断，因此“城乡一体”写作模式的价值再次体现。

吴超然的经营意识和实践起步源于“投机倒把”，此外还具有强烈的从政意识。作为成功商人，吴超然担任过政协委员及政协常委，之后劳马进行时空切换，从现时城市退回少时乡村，讲述葫芦镇中学初三年级的“野心家”侯家常最终破产的“阴谋活动”。童年吴前方作为“行动”的参与者得到豁免，但近距离接触到的政治核辐射改写了主角基因排列方式，小说从一开始塑造出的便是一个“政治人”而非“经济人”。这种历史关联还通过暗示得以呈现，令伊万颇感棘手的中学垮楼事故中垮塌的教学楼并非吴超然承包的工程项目，与学校一墙之隔的新时代广场则由吴超然承建。广场固然发生了礼炮架倾倒是引发爆炸，但并无人员伤亡，事先准备好的新闻稿如期刊出，正剧也因草草结束而成为一出笑剧——情节层面（官场）和阅读层面（笑）均为牵扯到问责机制——事态比教学楼垮塌的严重程度轻微许多。在这里，作者将富于政治、历史意味的“广场”^①与吴超然关联，并撇清其与教育^②和豆腐渣工程的联系。

二

一路走来，吴超然不可谓不顺利，也不可谓不艰辛。在村里，参与“阴谋活动”险受牵连，成为车把式前又遭人质疑，通过威胁村长才换来高考资格，读书期间因打麻将送入公安局，后因于辰家长状告校方导致退学，在蛇口做搬运工，在深圳走私商品，遭遇离婚和惊人补偿费，为帮助伊万而承包的煤矿事故不断，妻子王小丽的贬低，与心腹助手田一禾分道扬镳，被剥夺省政协席位，成功道路上的吴扯淡及吴超然从来就没少遇见过失败。相反，同村的伊百则更有成功的希望，高考成绩是前者的四倍多，进入了北京一所综合性大学，选取了当时热门的哲学专业，顺利完成本硕博阶段学习，评上了副教授又破格晋升教授并担任教研室主任，成为小有名气的学者。劳马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是，历史发生了什么令原本的失败者摇身一变成为成功人士，原本优秀之人却落败凄苦。

① 出于群众游行集会的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广场规模大多较为宏大，相反资本主义国家出于方便管理游行及商业开发等因素的考虑，广场相对狭小。时至今日，政治色彩虽然淡化，“广场须大”的理念已经作为民族文化基因和历史活化石延续下来。

② 更确切地说是西式教育或精英教育模式，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极力反对的事物。改革开放后，教育的等级性和精英性得到恢复，并且在改革深化后因为教育产业化导致精英教育披上了市场模式的外衣。因此小说中“广场”“教学楼”的意象基本可以作为这种社会思潮及历史阶段的象征。

然而如果变换视角,吴超然其实一直是一个“边界人”或者说“跨界人”,有私心的无产者、被退学的大学生、官商黑三道借路、钻法律空子的守法公民、对公正心存敬意的唯利是图者等等,这种身分会遭受板块间的挤压,也能看到板块内部难以寻觅的机遇。身处不同板块之间,他就不能按照正常轨迹生存,不断地试错造成了表面的不断失败和内在经验的不断积累,这正是伊百给学生讲述得头头是道、自己却并未领悟的“世界是运动的、运动是绝对的”这一哲学教义。敬文东在他奇异而睿智的评论中提醒大家重视哲学型傻瓜形象:“真正的哲学是‘做’,不是‘想’和‘说’;哲学必须要成为可以用于做事的学问;……劳马在幽默、狂欢化的叙事中,为自己的小说写作贡献的隐蔽基础(或基本逻辑)无疑是:如果哲学不与生活发生肉体关系,……哲学休想‘知道’生活之本质。”^①在某种意义上,小说中的英子是吴超然的影子,伊百也是吴超然的另一种可能,乃至伊万和主人公的命运关联和内心默契也有双胞胎的错觉。通过小说编织的真实幻境,历史与社会的纷繁复杂被归纳为几位主角,几位主角其实是一个人的不同状态,也包含着作家个体生命对他们的体认,实现“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的互相推动。

抛开制度化生存的压抑性和边界人的灵活性,比较吴超然和伊百的言行和相关叙事不难发现,“城乡一体”的叙事策略仅落实于前者。小说对家乡的两个评价“在在者的在中存在着”和“抹布”都出自伊百,体现着哲学家的机智与概括力,但这种富于深度的思考并未与其后来的历史形成有效对接,如同小说题材划分一样,“哲学”被分割在“乡土”和“城市”的不同空间内,面对政治运动,无论是语言或行动上,伊百都不能真正理解并介入其中,知识分子从变革的健康力量渐渐变成了历史的旁观者。伊百面临的问题正是我们所有人的困境。

与伊百形成鲜明差别,“吴超然……必须在巨大的变动中寻找那些不变的东西,那些能够固守本原的东西,借助这些东西,吴超然才能处变不惊,才能在完成自我的同时不至于陷入人格上的分裂。由此,这部小说同时又是一部‘向后看’的小说,它同时也是一个关于寻找和救赎、回忆和坚守的故事。”^②拒绝“去历史”,而是主动将自己“历史化”,通过历史认识现实。吴超然用以坚守自我并认识社会的基础,正是劳马自由转换“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的保障,外在的“城乡一体”叙事策略也与内在的主人公心理机制构成了高度一致性。缺少这种设置的伊百,纵然具备高超的思辨能力和全套西化教育训练,仍然困在专业词汇、政治事件和生活琐事之中,劳马的哲学和伊百的哲学之间横亘着鲜明的鸿沟。劳马是荒诞化和戏剧性的高手,完全无惧历史意识分配在不同人物上的巨大反差,意图得到了充分彰显。

可见,作家编制长篇是为了实现其艺术雄心,即以吴超然的事业成功为引子,通过有意

① 敬文东:《小说、哲学与二人转——劳马小说阅读札记》,《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

② 杨庆祥:《现实主义的“变”与“不变”——读劳马的〈哎嗨哟〉》,《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6期。

识的“城乡一体”的叙事策略关连起前后四十年进行历史阐释。回望劳马以往的作品,中篇小说有意识地处理某一明确段落的历史:“十七年”之于《傻笑》、“文革”之于《抹布》、改革开放之于《伯婆魔佛》、八九十年代之交之于《飘扬的迷彩旗》、二次改革之于《烦》,这些小说连缀起来就是一部艺术化的当代历史。

最终《哎嗨哟》以如此面貌示人:打通时间和空间的间隔,包纳了新中国初期、“夺权”时期、改革时期和新世纪以及之间的过渡段,跳跃在北京、广州、深圳(及蛇口)、“省城”、葫芦镇歪脖子村乃至洛杉矶、拉斯维加斯,活跃着资本家、官员、知识分子、农民、伪宗教人员、学生、城市居民、普通职员乃至涉黄工作者,拉起几个顶角,高效地撑起了全景式的当代史,以有意分配的“城乡一体”叙事构建的独特历史观,回答了中国历史、社会、官场、商界、学界、社会思潮等领域现状何以如此的问题。在作家看来,历史和生存空间是彼此连接、互为因果的,改革时期和革命建设时期并非断裂而是有机一体——前者由后者的间隙乃至部分地由中心发展而来;城市和乡村并不彼此分离或对立,前者受到后者支持、推动,反过来城市也带动了乡村的发展并将其吞噬、毁坏。

在刘芳坤的论述中,“城乡一体”主要是针对“笑”的对象无差异性提出的,这与劳马一贯的创作思路一致。笑一切可笑之事,无论是光彩熠熠的吴超然、伊万,还是灰头土脸的村长、伊十,通过“城乡一体”叙事打通的当代历史,都需要通过“笑”对其进行调整和重新认识。至于“笑”的细节,比如知识分子的迂腐、官商两界的潜规则、海归的狂妄无知、改革潮造就的“经济动物”、农民的闭塞等都是作家擅长的技能施展领域。另外对从历史走来、叱咤当下的同龄人的嘲弄,搭配的另一端是对下一代的希冀^①。对学生的关爱可以归入这种情感,也令其小说呈现出乐观的光芒。可以说,劳马的小说创作是创作给评论家、学者看的,也是创作给普通民众尤其是其中的年轻人看的。与时代同步的年轻人同正在前进的历史一样不可避免地具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劳马看来,愿意笑的人(社会)迟早会解决存在的问题。对历史绽放出笑容,暗示了笑者宽容的态度:他认为所有问题都不是严重到无法解决的程度,通过笑的惩戒效力足以拆解并修复受损的历史和现实机制,同时因为被笑者的潜在威胁已经被“笑”所“缴械”,成为橱窗里的陈列品而不是“潜伏敌人”,反而拉近了观赏者对历史的距离,并传播这种全面冷静历史观和健康社会力量。

三

当然在认同《哎嗨哟》的杰出价值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出自业余作家之手的长篇处女作

^① 张小刚:《智者的历史叙事与想象——读劳马的长篇小说〈哎嗨哟〉》,载林建法主编《说劳马》,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5页。

存在的“不掩瑜”之“瑕”。在一次研讨会上,青年评论家傅逸尘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作家心悦诚服也早已发现的局限:“离开这种幽默和形而上的思辨,劳马的写作可能相对笨拙一点,这在他的长篇小说体现的比较明显。……在写长篇小说时也有一些细节、情节,但是更多是为了让故事情节完整、让人物生活的逻辑更完整而去硬写,所以缺乏一点文学的感觉。我认为在写实和还原生活能力的方面可能并不是劳马最擅长的。”^①一方面是写作长篇的技巧准备略有不足,另一方面其短篇小说的长处用于构造长篇则难免掣肘。傅逸尘的批评恰恰体现出其训练有素的文学涵养,《哎嗨哟》在结构和细节方面存在较为显在的疏漏。虽然前几节城/乡、今/昔之间的转换颇富于创意,但未能持久,大部分篇幅不能实现这种意图,甚至转换略显僵硬,情节线索的连贯性也有些许问题。短篇小说中作家擅长的高手过招般点到为止的含蓄,也因长度需要而加入铺垫,致使许多嘲讽成了赤膊上阵式的批判,影响了局部笑意的生成。

小说叙事上呈现的症结与小说的容量相关——以20万字篇幅书写一部关于40年乡村变迁、40年城市变革、40年知识分子生存状态、数十年商界波澜、40年宦海沉浮以及40年社会风貌的长篇小说,要么成为长河小说,要么凝练成为光盘跳碟式的正常篇幅,这种容量与作家“城乡一体”的大历史观一脉相承,因此其中缺陷很难悉数避免。小说的不精巧未必就不能视为独特的贡献,莫言、阎连科先后大胆地将中篇小说聚合成为长篇小说,余华将语言简化到令人胆寒,都成为文学研究者津津乐道的话题。除了别具一格的深度历史观,短篇小说合集的长篇结构方式、简练深邃的哲学式语言、笑的全程广泛运用等,不妨看作是一次有益的写作实验。另外长篇小说固然需要饱满的细节作为支撑,但我们反思劳马小说的同时,不妨参照其作反思文坛创作现状。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细节肥大症”越来越引起学者的注意,由此不难看到劳马小说矫枉、正视听的重要价值。

宋徽宗赵佶是书画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创立的“瘦金体”书法瘦挺爽利、笔法犀利,是一种风格独特的字体。当代著名学者、书法家启功或许吸收了瘦金体精义,创造出影响深远的“启(功)体”。观看这种字体,与劳马小说的阅读效果十分接近,犀利简捷,如同暗夜闪电,又能折射出书写者自身的精神气质。有人认为瘦金体适合画旁题字,但仍然有《秣芳依翠萼诗帖》这样充满气势的大楷精品。擅长写短篇小说的劳马贡献的出人意料的《哎嗨哟》,正是这样的瘦金体大楷作品。

(艾翔,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周翔】

^①《劳马作品研讨会会议纪要》,载林建法主编《说劳马》,第239页。